

去神化:夏志清、夏济安的鲁迅研究之比较

王琳

[提要] 本论文通过对夏志清与夏济安鲁迅研究的比较性阅读,考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去神化鲁迅研究之间的差异,客观剖析了两位杰出文学史家的研究立场,突破了以往研究中简单地将夏志清的偏见归咎于意识形态差异的研究结论,揭示出了思维方式、个体体验等都对文学史家的批评与研究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 美国汉学;去神化;鲁迅;夏志清;夏济安

中图分类号: I2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8)03—0169—04

作者简介: 王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四川成都 610068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早在1940年,《鲁迅小说选:阿Q及其他》由美籍华裔学者王际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就在王际真翻译《鲁迅小说选:阿Q及其他》出版的前一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P.42)}这一纲领性文件将鲁迅纳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框架之内。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话语对文学史编纂的强力渗透,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旗手被大肆渲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迅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中国现代小说之父”,还被建构为“左翼文艺运动的旗手”、“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当国内学界轰轰烈烈地开展造神运动的同时,美国汉学家以“彼岸”的角度来观察、透视中国文学及文化,对在国内举足轻重的经典作家鲁迅进行了重新研究,拭去其环绕周身的光环,通过多种方式展开一场“去神化”解读。本论文通过对美国汉学家夏志清、夏济安的对比阅读,解析美国汉学界鲁迅研究“去神化”的多种方式和根源。

—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章中专门讨论了鲁迅的文学创作。他以世界文学为坐标,凭借开阔的研究视角和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鲁迅的作品,“把鲁迅最好的小说与《都柏林人》互相比较:鲁迅对于农村人物的懒散、迷信、残酷和虚伪深感悲愤;新思想无法改变他们,鲁迅因之摈弃了他的故乡,在象征的意义上也摈弃了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2](P.26)}。夏志清的研究一方面努力增强鲁迅作品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另一方面以国内学界为参照物,

尝试通过具体的作品解读祛除鲁迅身上的神话色彩。夏志清的“去神化”鲁迅研究范式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深入而全面地探讨鲁迅的小说创作实绩。夏志清认为,鲁迅的作品“最佳小说都收集在两本集子里:上述的第一集《呐喊》和第二集《彷徨》。这两本小说集和好几本散文集,以及他的散文诗集《野草》都是他在北京创作力最强时期的作品”^{[2](P.26)}。与此同时,各种不足与缺陷散落其间,《狂人日记》虽然极其精练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弊害,但是狂人的幻想因远离现实而难以戏剧化,《阿Q正传》尽管塑造了各种民族劣根性集于一身的典型人物阿Q,但小说的艺术结构松散而机械。而从总体上看,《彷徨》中作品的艺术价值较之《呐喊》更胜一筹。在鲁迅小说的所有技巧中,夏志清对讽刺艺术技巧尤其重视,认为《肥皂》的讽刺技艺最为高明,“就写作技巧来看,《肥皂》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2](P.34)}。夏志清对《故事新编》持否定倾向,认为“《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2](P.35)}对于杂文创作而言,夏志清对鲁迅前期的杂文持肯定态度,早期杂文“往往有生动而不俗的意象或例证,时而有绝妙的语句,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这些作品“攻击落伍、无知和政治腐败,大力主张精神重建”,尤其是收录在《坟》和《热风》中的作品都是“比较重要”的。^{[2](P.36)}但对于鲁迅后期的杂文则倾向于否定,否定的主要依据是鲁迅的创作目的。

其二,分析“神化鲁迅”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夏志清认为,鲁迅备受推崇的原因有二:首先,鲁迅自身在文化界拥有较高声望。自由主义派评论家、左派批评家都对其有过赞誉。第二,源于政治

因素。“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期间,对鲁迅的推崇,对共产党特别有帮助,因为他的作品可以用来加强国民党贪污和腐败印象”^{[2] (P.24)}。“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鲁迅被视为一个受人爱戴的、爱国的反政府发言人,甚至于毛泽东也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觉得应该向鲁迅致以最高的敬意”^{[2] (P.23)}。夏志清明确地指出了政治因素对鲁迅的文学史地位的形成乃至走向“神化”起着主导作用,从而引发了“自从他于1936年逝世之后,他的声誉更越来越神话化了”^{[2] (P.23)}。

其三 特立独行的文学史定位。对于鲁迅的历史定位,夏志清首先承认并肯定了鲁迅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同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刊读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2] (P.23)}。然而,他对鲁迅的战斗精神进行了否定。“鲁迅的反动性格,充分地表现在他对于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嘲讽”,“对于这类攻击,鲁迅报之以他惯有的讽刺和自信。可是在内心里,他却感到困扰,没有把握。他一向自认为青年导师,但现在学生却背离他的领导,走向一条新路。”^{[2] (P.37)} 这些论述不仅具有很强的否定性,甚至带有非理性色彩的人生攻击。夏志清更明确地指出“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2] (P.40)}。在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其予以全力关注、盛赞的作家是张爱玲。相形之下,在夏志清的小说史中鲁迅的文学史地位远不及张爱玲研究,而且充满偏见。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不久,汉学家普实克与夏志清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面对质疑,夏志清撰文回应了普实克的批评,进一步阐释了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观、方法论和价值标准是对审美判断和文学独立性的坚持。那么,《小说史》的批评立场是否如夏志清所宣称的“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2] (P.327)} 事实是在面对鲁迅时,夏志清的尺度变得格外严苛。在具体的评述中,仅从唯美视角进行观察,而忽略鲁迅的创作动机在于“为人生”、改良人生。夏志清读出了存在于鲁迅身上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但对作品中意蕴、意象组合等方面所具有的模糊性与深刻性却视而不见。同样呈现了现实的人生和永恒的人性冲突,鲁迅的作品却没有获得认同。这种种的迹象都表明了夏志清的纯文学立场实际上并不够纯粹,而充满强烈的对抗色彩。《中国现代小说史·结论》一章中,夏志清对中国大陆50年代现代文

学史的基本史观进行了反思。“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政治的正统性成正比。一位作者的声望,终须视他在文坛与政治上的地位,以及他能否保持对党忠贞不贰的清白记录而定”^{[2] (P.318)}。他以鲁迅、茅盾等为例,论证当政治标准取代了审美标准,文学的独立性随之被否定,最终形成了夏志清反对政治渗入文学,坚持文学的非功利性的纯文学观,确立文学的独立价值需要打破功利主义。由此可见,夏志清的纯文学立场背后隐含的参照物是其时国内大行其道的阶级论文学史观,其话语倾向是反对阶级论文学史观。《小说史》始终无法绕开政治偏见以及由政治立场引发的艺术偏见。刘再复就认为,夏志清试图远离政治来保持文学批评的独立性的尝试,并没有走出政治的阴霾,“当他在反对大陆用政治意识形态否定一群作家的時候,自己却陷入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之中”,而“这种偏见,是上世纪中叶政治斗争、党派斗争在文化上的投影与烙印”^{[3] (P.55-58)}。

二

鲁迅研究及美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另一重要学者是夏济安。夏济安的鲁迅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是:回归学术逻辑。夏济安试图回归作家本体,潜入鲁迅的精神世界,挖掘和凸显鲁迅的文化选择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历史价值与历史意义。其鲁迅研究的代表作是收录于《黑暗的闸门》中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鲁迅与左联的解散》。

首先,通过对鲁迅与左联关系的梳理,摆脱冷战思维的干扰。一直以来,学界对鲁迅的认识存在着偏差,认为鲁迅“不仅是左联的明星作家,还一度是左联的守护神,是它存在的象征。‘只要有鲁迅先生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有鲁迅先生不垮,左联就不会垮’”^{[4] (P.97)}。然而,夏济安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尤其是1933-1936年间鲁迅日记、书信以及冯雪峰、萧红的回忆,全面呈现了鲁迅与左联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生命的最后历程里的思想状况。第一,从左联的领导权来看,鲁迅虽然一度以其无情的批判、无敌的论战成为了左联的顶梁人物,究其原因“一是鲁迅本身对共产主义革命抱着极大的热情,二也因为鲁迅与瞿秋白、冯雪峰私交甚笃”。可是,“他既不参加党的定期例会,也不全然了解党的政策、活动和密谋”,在与胡风的通信中,鲁迅流露出了在冯雪峰离开之后对左联的失望甚至不满和愤怒,同时以鲁迅写给杨霁云的信佐证。^{[4] (P.97)} “从1934年末至1935年间,鲁迅感受着四周的寒意,独自舔舐伤口”^{[4] (P.109)},这些史料都表明鲁迅并非左联的实际领导者,而且在冯

雪峰离开后,他与左联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并渐行渐远。第二,从“两个口号”论争来看,“左联的解散是鲁迅生命里最后一场危机”^{[4] [P.117]}。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以六千字的篇幅言辞激烈地批判了徐懋庸,表明了自己对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是要为文学创作争取最大的自由。通过爬梳大量史料,夏济安认为鲁迅仍然是一位拥有独立人格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独立人格所拥有的品质却为他的读者所熟知;凡读过鲁迅论战文、讽刺文的人,一定不难体会出他的尖锐冷峭、他挑起笔战时的狂喜和他坚守立场时的胆量”^{[4] [P.98]}。

在得出鲁迅是一位独立作家的结论之上,夏济安的研究进一步以鲁迅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因子为切入点,深入地发掘鲁迅内心深处的黑暗面。反传统是鲁迅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之一。一般认为,鲁迅义无反顾地反传统精神与其说来自于历史理性,毋宁说来自生命意志的一种文化选择。夏济安联系《说唐》中的典故,以力撑千斤闸营救各路豪杰的巨无霸英雄来比喻鲁迅,暗示鲁迅背着因袭的重负,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一生。作为扛起“黑暗的闸门”的人,鲁迅一方面抵御着传统,“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4] [P.129]}。另一方面,鲁迅又宁愿背着因袭的重担耽于对传统文化的痴迷,在激烈地反传统的同时,自身却难以摆脱传统,其文风、遣词造句甚至思想等都深受古代文言作品的影响。理解了鲁迅对待传统的矛盾才能进而解读鲁迅的创作,其创作中存在大量的“黑暗”的阴影。夏济安认为这种黑暗的重压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二是他自身不安的内心。鲁迅强烈地感受到这两股力量压迫着他、穿透着他,却又无可逃脱”^{[4] [P.135]}。夏济安还深入地分析到,黑暗体验与鲁迅创作的心理深度和高超技巧融为一体,成就了鲁迅的创作成就,创作了极富个人色彩的《野草》。《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内心深处的矛盾,“他对光明的信念最终未能驱散黑暗,但也至少抵挡住了黑暗的致命引力”^{[4] [P.134]}。而黑暗体验同时也构成了鲁迅创作的内在动因,影响着鲁迅走向杂文创作,对黑暗的洞悉同时成为了鲁迅杂文创作的心理背景。黑暗体验伴随鲁迅一生,鲁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是黑暗体验的延续。因此,“黑暗”的力量对于鲁迅创作有重要意义。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夏济安有意识地将历史意识和文学的审美判断相融合,打通传记、历史和批评之间的界限,爬梳了鲁迅与左联之间错综复

杂的关系,对隐藏于鲁迅精神深处的人格气质进行了探幽抉微的审察,认为鲁迅代表的是“新与旧的挣扎,和超越历史存在的更深层次的冲突”^{[4] [P.139]}。从这个意义上看,夏济安的研究对受到冷战思维影响的鲁迅研究起到了祛魅的作用,也对此后汉学家的研究具有启示性意义。与此同时,鲁迅在中国大陆,被奉为精神偶像,被严重意识形态化,直至演变为鲁迅神话。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鲁迅是最为重要的现代作家:不仅在研究著作中用巨大的篇幅容量加以关注,而且研究者几乎都以一种“颂歌”的方式来肯定鲁迅,塑造了一个高大而完美的鲁迅形象。可是,为什么《野草》中弥漫的浓郁的悲观、绝望情绪与充满战斗精神的鲁迅形象截然不符?为什么鲁迅“对于‘鲁镇’,有着一种既‘恨’又‘爱’的复杂情感”?^[5]高大而完美的“革命领袖”形象,竟无法解答这些问题。盛名之下,鲁迅的作家本体被无数的光环所遮蔽,就在神化和理想化过程中作家本体反而不受重视,甚至被刻意掩盖起来。因此,夏济安的研究回归学术逻辑,其祛魅作用是具有双重意义的。

三

那么,夏志清为何对鲁迅不仅定位不高而且结论相对草率呢?通过对夏氏兄弟研究成果的对比性阅读,不难发现夏志清是将鲁迅视为阶级论文学史观下经典作家作品建构的第一范例来进行解读的。笔者认为,夏志清直接将鲁迅其人其作与文学史背后的文化权力相联系相等同。因为其时在中国大陆,编写现代文学史之处,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对鲁迅其人其作顶礼膜拜,“神化”鲁迅成为其时文学研究的基本生态面貌,研究者几乎众口一声地大加赞赏、推崇,没有任何反面意见,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神化”倾向。而夏志清坚守作为文学史家的独立性,尤其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干预。研究中他把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干预的矛头指向了鲁迅,因此,与其说夏志清是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贬抑,更准确地说是以去神化的姿态对导致鲁迅神化的背后力量的抗拒与抵制。从以下事实可以进一步看出,鲁迅疏离革命疏离政治的姿态,夏志清是了然于心的,“1927-1928 这两年,鲁迅既不左又不右,变得完全孤立”^{[2] [P.37]}。因此,夏志清对鲁迅的贬抑折射出了文化场域中的权力之争,是“以‘审美’、‘文学自身’标准相标榜而贬低革命作家的学人,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其与利益与权力的干系”^[6]。其鲁迅研究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

夏济安的鲁迅研究始于去美之后。1959年3月,夏济安由台湾赴美,同年完成了《五烈士之谜》,第二年他又撰写了《鲁迅与左联的解散》,1964年《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发表。返回历史的现场:夏济安在岛内生活长达八年之久,正值国民政府战败之后撤退至台湾,为巩固政权,实行了戒严政策,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文化政策都迅速收紧,尤其是严格地全面控制书籍出版、发行,以实行全面有效的文化管控。在岛内,大陆的作家作品一律严禁阅读,而鲁迅的文学作品则明令不允许公开阅读、出版、流通。与此同时,岛内当局积极倡导战斗文艺运动,即通过各种文艺管道和文学活动积极推动战斗精神和反共意识。1955年春,岛内正式发出了“战斗文艺”的号角,要求作家、文学家放弃个人单独的行动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文学须肩负战斗的崇高使命,同声讨共产党。战斗文艺运动横贯了台湾整个五十年代,导致政治意识形态先行而缺乏生活实感的概念化作品甚至是口号式情感宣泄充斥岛内文坛。在台湾严酷的文化氛围中,1956年,《文学杂志》在夏济安、吴鲁芹与刘守宜等的推动下创刊。该刊提倡写实文学,反对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扰,肃清了战斗文学引发之流弊。《文学杂志》的创办之于夏济安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学杂志》的创办与编辑,夏济安走上了文学批评之路。在编辑的过程中,夏济安开始对岛内的文学创作现状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行思考。如《旧文化与新小说》、《白话文与新诗》、《关于新诗的一点意见》等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新文学走过的历程,侧重考察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古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深层品质上的联系。

尽管其鲁迅研究中某些结论可再商榷,而论著中关注意识形态、传统束缚和政治压力在他头顶上形成了巨大而“黑暗的闸门”的鲁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当时在岛内正在遭受政治力量倾轧的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反观。可以说,“当我们去思考‘黑暗的闸门’的意象时,不难可以赋予它另一层的含义:政治的重压,可不就是一道更沉重的‘黑暗的闸门’,把文学作家以至研究者重重围困着?夏济安在世的景况当然是太不堪说,台湾几十年的森严文网……作家始终受到像鲁迅、瞿秋白以至蒋光慈等人所经历过的束缚和限制”^[4] (P.24)。意识形态对文学领域的影响并不鲜见,作为文学批评者怎样保持论断与考证的客观性就成为了旅美后的夏济安的思虑之所在了。夏济安秉持着独立的文学理念和文化精神,开启

了赴美后的学术研究,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走向的关注是其学术思考的切入点。

结语

由此可见,夏志清、夏济安的鲁迅研究尽管都以去政治化为研究宗旨,但夏志清因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走向了研究的另一极端,正如相关学者在书评中所述:“(夏志清)学问之渊博,批评眼光之独到,在此一览无遗。当然,他的反共立场和他对此书讨论到的大多数作家的意识形态之敌视,也是一样显而易见的”^[7] (P.24)。对鲁迅的第一次去神化解读尝试,被冷战阴影所笼罩,夏志清将鲁迅视为政治干预文学的典型,是阶级论文学史观的象征符号,简单化地将文学史的书写权力与经典作家相关联,对鲁迅做出的解读有些并不准确甚至充满偏见,因而是一场睿智与偏见并存的阅读。夏济安则因为岛内低气压的文化氛围使得其对创作自由与个体自由的向往追求更显强烈。他一度通过《文学杂志》的编辑试图冲破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驶向自己理想的文学彼岸。就如同他试图通过《文学杂志》来对抗战斗文艺,夏济安在美国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中通过其鲁迅研究传达出了其对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把握,在其研究视野中文学和政治不失对立的存在,他从政治的维度阐发文学,理性地看待文学里的政治因素,文学与政治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了一起。他始终关注的是,文学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及在特殊的文化境遇里知识分子的命运,因而其研究更彰显了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多维性。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二)[M].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0.
- [2][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3]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 [4][美]夏济安.黑暗的闸门[M].万芷君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 [5]宋剑华.“鲁镇”意象:一个破解鲁迅思想的重要符号[J].山东社会科学,2017(11).
- [6]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J].中国比较文学研究,2004(3).
- [7]刘绍铭.编者译序[A]//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收稿日期 2017-12-10 责任编辑 申燕